

二二八事件前後高雄臺籍社會領導階層之分合：以楊金虎為中心

撰文／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基礎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王御風

摘要

二二八事件為戰後臺灣史上最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一，其對戰後臺灣政治、社會發展影響甚鉅。有關二二八事件在臺灣政治上的影響，一般研究皆認為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除許多臺籍政治菁英在事件中喪生，其餘曾經歷、目睹事件發生後慘劇者，在當年肅殺的政治氛圍下，致使眾多臺籍菁英對政治也心灰意冷、退出政壇，因而造成臺籍社會領導階層的嚴重斷層。

二二八事件對臺灣政治發展確有重大影響，但從近年來的研究也慢慢指出，二二八事件前，其實臺籍社會領導階層就已出現各種分合。以高雄市為例，日治時期中後期，楊金虎、林迦、郭國基、黃慶雲等商人、醫生便匯聚鹽埕，臺籍社會領導階層彼此合作交流。

日本戰敗後日人離臺，形成戰後初期的政治真空，這些臺籍社會領導階層為了彌補真空，展開分合，二二八事件是戰後第二次的重組。從楊金虎的例子，可以清晰看見這段時期臺籍社會領導階層的分合。本文就以高雄市前市長楊金虎為切入點，探討日治時期晚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，臺籍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。

關鍵詞：二二八事件、楊金虎、林迦、郭國基、鹽埕

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之寶貴意見。

投稿日期：2017 年 9 月 20

接受日期：2017 年 10 月 30



- 壹、前言
- 貳、日治時期鹽埕臺籍社會領導階層政商網絡的建立
- 參、楊金虎在日治時期的政治活動
- 肆、二二八前高市政治發展與楊金虎
- 伍、二二八事件與楊金虎、黃賜、郭國基
- 陸、楊金虎與林迦
- 柒、結論：二二八事件前後高雄臺籍社會領導階層之變遷

壹、前言

戰後高雄市政發展，二二八事件是個重要轉折點，不僅許多剛崛起的政治新星因此隕落，也有許多在日治時期與臺灣總督府對抗，心懷祖國的政治人物，轉與政府對抗，成為日後「黨外運動」的重要基石。最著名者為楊金虎與郭國基，兩人均於日治時期加入臺灣民眾黨，並攜手合作，對抗日本政府，但戰後初期卻互相抨擊。二二八事件後，又一起走上黨外之路，當選重要公職，楊金虎曾任國大代表及高雄市長，郭國基則曾任省議員。

楊金虎在戰後，除了郭國基，也跟黃賜、林迦有相同紛爭，但黃賜不幸在二二八事件中過世。林迦則是楊金虎來到高雄的主要推手，且在二二八事件中為楊金虎作保出獄，但戰後不論在三信的經營權或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，楊金虎均與林迦家族有所競爭，也引起林迦不快。

從楊金虎與這些臺籍社會領導階層交往過程，可以看到高雄日治中後期到戰後初期，尤其是二二八事件前後，臺籍社會領導階層網絡極具變化。

關於二二八事件對臺籍社會領導階層產生的影響，論述頗多。如鄭志敏教授曾以高屏地區醫師階層及高雄市參議員為主討論，¹ 筆者也同樣探討過高雄市參議員與社會領導階層之關係，² 但兩文均以大面向來觀察，而非以個人經歷來觀察整體歷史變遷。

楊金虎是高雄政治發展上極為重要人物，對於二二八事件前後高雄臺籍領導階層的

1 鄭志敏，〈日治時期高雄地區臺籍醫師的政治與社會參與（1920-1945）〉，《高市文獻》，19（1）（2006），頁13-56。鄭志敏，〈從「市參議員」到「悽慘議員」——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〉，《高市文獻》，22（1）（2009），頁37-68。

2 王御風，《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（1920-1960）》（臺北：玉山社，2013）。

變化，也極具關鍵。但可惜以往並未有人專門針對楊金虎討論，故本文以楊金虎做為切入點，觀察日治中後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，高雄臺籍社會領導階層之演變。

貳、日治時期鹽埕臺籍社會領導階層 政商網絡的建立

楊金虎出生於臺南州新豐郡歸仁庄八甲655番地，為歸仁望族之後，父名楊眼，字仁和，應為楊金虎開設之仁和醫院名稱之由來。生有三男，長男名澎湖字金龍，曾擔任保正壯丁團團長、歸仁區長。次男名清潭字秋澄，曾投考新樓醫院學習西醫，並曾擔任書記、中洲區長，後繼兄長擔任歸仁庄（區）長，臺南州參事等職。³

楊金虎先後畢業於關廟公學校、臺南實業學校，大正9年（1920）再以優異成績畢業於總督府醫專，先到紅十字會臺灣支部醫院及臺南病院實地見學，累積不少經驗後，獨自於岡山郡湖內庄開設醫院，後與其二哥共同回家鄉歸仁開設「仁和醫院」，但後來因操勞過度，突發急性肺炎，住進臺南庄司病院開刀治療將近二個月，出院後因停業過久，診所生意不佳，恰好



圖1 楊金虎（日治時期拍攝）

資料來源：〈楊金虎市長照片〉，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，登錄號：KH2006.002.008。

3 楊金虎，《七十回憶（上）》，收於張玉法、張瑞德主編，《中國現代自傳叢書第二輯》（臺北：龍文，1990），頁1-2。

關廟公醫川崎俊雄欲離職，遂於大正 12 年（1923）轉赴關廟擔任公醫。⁴

楊金虎在關廟時期，也被選為關廟庄協議會員，開啟其政治生涯。但川崎俊雄就任公醫時間很長，頗受當地人信任，⁵其辭職後在關廟開業，病人仍多找川崎醫治，楊金虎生意不佳，且其次男在關廟出生後 40 日即夭折，使得楊金虎萌生去意。剛好高雄州生果組合有個中國滿鮮視察團，楊金虎隨之考察，並趁此機會待在日本就讀醫科大學專門部，取得醫專畢業文憑。

楊金虎此行結識高雄著名商人林迦，在其邀請下，昭和元年（1926）回臺後，即辭去公醫至高雄，5 月 1 日租下林迦與黃慶雲在新興街之店鋪開業，⁶當時高雄的西醫僅有李炳森及莊媽江兩位，楊金虎的仁和醫院生意頗為興隆。在昭和 6 年（1931）楊金虎將醫院遷往高雄市鹽埕町四丁目 16 番地（今鹽埕區瀨南街），此為新築三層樓高洋樓建築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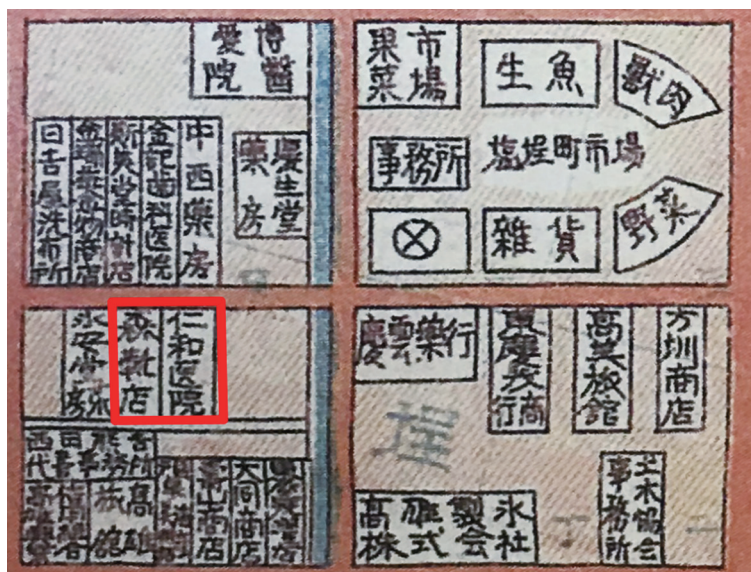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 楊金虎位於鹽埕町二ノ二十の仁和醫院

資料來源：木谷佐一，〈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〉（東京交通社，1929）。



圖 3 仁和醫院（日治時期）

資料來源：〈尾上醫院／仁和醫院〉，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，登錄號：KH2015.005.474。

4 楊金虎，《七十回憶（上）》，頁 55-61。

5 川崎俊雄從明治 43 年（1910）就在此地擔任公醫，見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（1910）》（臺北：臺灣日日新報），頁 334。

6 楊金虎，《七十回憶（上）》，頁 61-68。

病房一棟，同時設立產婆講習所。為服務清貧之病患，特別設立免費產室、貧民治療部，若貧苦病患看診可享醫藥費減半或免收費用，⁷ 頗獲民眾好評。

楊金虎來到高雄後，自言受到林迦、黃慶雲、黃德銘、黃自新、洪槌等人的協助，洪槌為其姊姊的義妹夫，⁸ 黃慶雲及黃德銘則為鹽埕當地富商，且以力邀他來高雄的林迦為中心，形成一個商業網絡，最有名就是「高雄興業信用組合」，也就是戰後的「第三信用合作社」。

林迦，字「西迦」，生於清光緒 14 年（1888），鹽埕人，自其曾祖父一代（林後）便定居鳳山縣大竹里鹽埕庄，世代以曬鹽、養魚為業。林迦的父親為林界、母親為張英，二人育有林學（長子）、林賞（次子）、林查（長女）、林迦（三子）、林阿娘（次女）等 3 男 2 女，林迦在家中排行第四。

林界與鹽埕的關係深厚，致力於鹽田的開發。明治 29 年（1896）瀨南鹽場鹽倉失火時，林界曾偕同蔣吉、胡朝清等鹽田業者，向日人取得販售所存官鹽許可。明治 35 年（1902）為從事打狗地區鹽業的改良與促進，成立「打狗鹽業協會」作為政府的諮詢機關，負責反映鹽民之意見，建構雙邊對話橋梁，林界由打狗地區的鹽業者推舉擔任會長。⁹ 在此基礎上，林界亦曾任鹽埕埔保正。¹⁰

據林界背景推測，林迦幼年家境應該不差，明治 31 年（1898）林迦自打狗公學校畢業後，又繼續進入書房深造漢文。明治 43 年（1910）為振興貿易公司代表人；¹¹ 大正 6 年（1917）林迦與兄長林學合夥，於鹽埕町二丁目 20 番地經營「茂源」商店，從事日用雜貨



圖 4 林迦

資料來源：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，《臺灣人士鑑》（臺北：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，1934），頁 209。

7 柯萬榮，《臺南州名士錄》（臺南：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，1931），頁 83。

8 楊金虎，《七十回憶（上）》，頁 68。

9 〈打狗鹽業協會の設置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（1902 年 2 月 28 日），第 2 版。

10 《臺灣南部紳士錄》（臺南：臺南新報，1907），頁 539。

11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，《臺灣人士鑑》（臺北：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，1934），頁 209。

的販賣。¹²

林迦事業版圖的開展，可說奠基於土地開發業。林迦曾數度遊歷日本各地，發覺橫濱、神戶等港口鄰近之處皆是寸土寸金，自此眼界大開，因而趁著高雄港築港工程進行同時，開始進行土地收購、開發。林迦曾向旗後的王欽參購入西子灣荒地 8 甲餘，並著手整地，之後以高價售予日人安岡卯太郎，1920 年間打狗地區土地飆漲，西子灣因地形面山臨海為遊覽勝地，配合當時隧道關建計畫，成為土地開發熱點。¹³

以西子灣之土地買賣獲利為基礎，林迦陸續以低價購買頭前港東岸河灘、前鎮、戲獅甲、苓雅寮、大港埔等處荒地，並看準鹽埕埔極具發展性，於今大仁路、建國路一帶購地興建樓房，¹⁴而這些荒地皆在日人築港後，成為黃金地段，林迦遂以此累積巨富，故照史在其著作中稱林迦為「打狗拓荒者」。¹⁵

林迦以地產累積資本，並跨足金融業，根據昭和 4 年（1929）出版的《高雄州商工人名錄》，林迦於鹽埕町五丁目 62 番地經營「金家」進行金融信貸。¹⁶之後於大正 11 年（1922）至大正 14 年（1925）間擔任「高砂信用組合」理事，並於昭和元年（1926）接手「中洲庄漁業者信用販賣購買組合」，將其改組為「高雄興業信用組合」。

林迦會跨足金融產業，與其姻親黃慶雲有關。黃慶雲，澎湖人，日治時期大批移民渡海來到旗津，黃慶雲也是其中之一，在旗後碼頭闖出名聲後來到鹽埕，為林脫的女婿，林脫為林迦之叔，黃慶雲即為林迦的從姐夫。¹⁷黃慶雲澎湖老家似為國術館，有漢藥底子，遂在市場擺攤抓藥治病。逐漸累積財富，至中國購買漢藥，辦理漢藥進口，並於北野町一丁目 9 番地開設慶雲質店（當舖）。¹⁸

大正 2 年（1913）產業組合法通過後，高雄陸續出現數個信用組合，同年（1913 年）成立的「高雄信用組合」（當時稱為「打狗信用組合」）為日人經營，歷史最悠久、規模最大，戰後成為「第一信用合作社」；次年（1914 年）的「高砂信用組合」由旗後臺

12 杉浦和作，《高雄州商工人名錄》（臺北：臺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，1929），頁 28。

13 〈打狗土地漲價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（1920 年 8 月 24 日），第 6 版。

14 林曙光，《打狗瑣譚》（高雄：春暉，1993），頁 107。

15 照史，〈打狗拓荒者——林迦〉，收於照史，《高雄人物評述 第一輯》（高雄：春暉，1983），頁 22-37。

16 杉浦和作，《高雄州商工人名錄》，頁 30。

17 林曙光，〈鹽埕五虎與苓雅寮五虎〉，收於《打狗瑣譚》（高雄：春暉，1993），頁 249；林迦，〈三信創業流水帳〉，收於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，《三信六十週年誌》（高雄：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，1978），頁 32。

18 杉浦和作，《高雄州商工人名錄》，頁 30。

商葉宗祺主持，也經營有聲有色，戰後成為「第二信用合作社」。

唯一經營較遜色是大正 6 年（1917）的「中洲漁農信用販賣購買生產組合」，此為中洲地區（今旗津中洲）漁民所經營，做為資金調度之金融機關，¹⁹ 在不景氣的 1920 年代，加上臺灣總督府連續頒布「水產會法施行規則」及「臺灣漁業組合規則」，嚴禁漁業團體經營營利事業，使其雪上加霜，股本由 10 元貶至 1 元尚無人問津，後於大正 13 年（1924）實施首次改組，依舊欲振乏力。

由於黃慶雲大正 12 年（1923）即在「中洲漁農信用販賣購買生產組合」擔任監事，中洲在日治時期與鹽埕緊密相通，²⁰ 當時鹽埕都是漁民，透過竹筏就可到達中洲，因此鹽埕民眾多半加入「中洲漁農信用販賣購買生產組合」，但理監事均由中洲居民擔任，鹽埕居民並無發言權。²¹ 大正 13 年（1924）改組失利後，在黃慶雲牽線下，由林迦出面，在昭和元年（1926）再度改組，更名為「高雄興業信用組合」，並遷至鹽埕埔，由鹽埕的林迦、黃慶雲、馮課、黃德勝、黃盤銘，與旗後的葉棗、李水、蔡智成、王天賞、董石福等人一同擔任理監事，10 名理監事名額由鹽埕、旗後各選 5 人擔任，²² 並由鹽埕人黃德勝出任組合長，黃德勝雖力圖振興，然仍成效不佳，因而黯然下臺。

昭和 2 年（1927）三度改組，由黃慶雲出任組合長、馮課任常務理事。²³ 林迦邀集三位著名的醫師：楊金虎、莊媽江、李炳森，以及各部落富商：黃德明、黃盤明（鹽埕埔）、李朝魁（林德官）、朱清琳（前鎮）、胡知頭、楊春安（鹽埕）出任理監事，²⁴ 並決議新任總監事每員存入定期存款一千圓，計一萬圓，以此穩定組合資金，1920 年代警察的月俸為 18 圓，到日本結束統治的 1945 年小學校的女教師薪水也才 50 圓，可見當時的一千圓已屬鉅額。²⁵ 信用組合自此漸入佳境，也跳脫該信用合作社為旗津中洲或鹽埕的地域印象。

昭和 11 年（1936）輔佐黃慶雲組合長有功的常務理事馮課因病請辭，林迦接任其職，

19 中山馨、片山清夫，《躍進高雄的全貌》（臺北：成文，1985），頁 233。

20 林迦，〈三信創業流水帳〉，頁 31。

21 莊媽江，〈興業信用組合的回憶〉，收於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，《三信六十週年誌》（高雄：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，1978），頁 88-89。

22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，《高雄三信九十週年誌：輝煌九十》（高雄：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，2008），頁 31。

23 林迦，〈三信創業流水帳〉，頁 33。

24 林曙光，〈高雄合作事業簡史〉，收於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，《三信六十週年誌》（高雄：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，1978），頁 23。

25 陳柔縉，《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》（臺北：時報出版，2009），頁 26。

隔年（1937 年）林迦長子林瓊瑤當選常務理事，昭和 13 年（1938）黃慶雲病逝於組合長任內，改由日人手貝千代志接任組合長。²⁶

林瓊瑤跟黃慶雲家族也頗有淵源，林迦當年託付在名古屋帝大學醫的黃朝枝（黃慶雲長子），將林瓊瑤帶去日本，林瓊瑤於早稻田大學學習經濟，畢業後返臺，林迦本打算讓林瓊瑤進入新高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服務，然當時在黃慶雲的偏愛及勸說之下，林瓊瑤乃至高雄興業信用組合服務，²⁷ 林瓊瑤當選為高雄興業信用組合的常務理事之後，林迦便於高雄興業信用組合引退，專心處理新高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事務。²⁸

林迦後期重心所在的「新高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」創設於昭和 12 年（1937），除林迦外，尚有駱榮金、黃慶雲、張武、蔡天鳳、董古錐、王木、易金枝、林塗盛、商霖等哈瑪星、鹽埕閩人，設址於鹽埕五丁目，由林迦出任組合長，黃慶雲為理事之一。²⁹ 這兩個組合，可說是以林迦為中心，聚集了以鹽埕為主的名人，其中經常與其合作的黃慶雲、駱榮金、胡知頭，加上蔡媽基，更被人稱為「鹽埕五虎」，³⁰ 楊金虎不僅與這些人相當熟悉，也曾擔任興業組合的理事。

參、楊金虎在日治時期的政治活動

楊金虎搬來高雄後，不僅在醫師本業獲得肯定，並與鹽埕政商交好，更展現其對政治的興趣。

大正 10 年（1921），臺灣文化協會成立，這是爭取臺灣人權益的主要組織。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後，高雄主要以任職於臺灣倉庫株式會社的楊振福及工會主席黃賜為主，楊金虎來高雄後，楊振福就常與楊金虎接觸，後臺灣文化協會分裂，臺灣民眾黨成立，楊金虎與楊振福、黃賜及另兩位醫師：李炳森、莊媽江均加入臺灣民眾黨，黃賜則被推選為高雄的主任委員。民眾黨還有另一名著名成員：郭國基，黃賜與郭國基均在戰後初期

26 林迦，〈三信創業流水帳〉，頁 35。

27 林迦，〈三信創業流水帳〉，頁 34。

28 林迦，〈三信創業流水帳〉，頁 32。

29 《高雄州下官民職員錄》（高雄：高雄ニイタカ社，1937），頁 48。

30 林曙光，〈鹽埕五虎與苓雅寮五虎〉，頁 249。



圖 5 臺灣民眾黨高雄支部結黨式紀念（第三排右六為楊金虎）

資料來源：〈臺灣民眾黨高雄支部結黨式紀念〉（1927 年 10 月 24 日），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，登錄號：KH2003.013.029。

與楊金虎有一番熱烈爭論。

除了加入臺灣民眾黨，楊金虎還參與了日治時期的兩次選舉，並且都高票當選，可見其對政治的興趣。

日治時期的臺灣各地議會，議員原本都是官派，在昭和 10 年（1935），臺灣總督府將其改為官派、民選各半，此為臺灣首次選舉。高雄市會議員名額定為 28 人，故民選、官派各 14 名。於昭和 10 年（1935）11 月 22 日進行投票，開票結果，民選的 14 席中，臺籍當選 5 席，日籍當選 9 席，分別為楊金虎、陳光亮、潘財源、駱榮金、陳天道、柏原武夫、

高木拾郎、川口長助、池尻重雄、田中泰作、真砂由次郎、中村秀、中島文雄、川野福太郎。³¹

臺籍 5 席中，陳天道後來因賄選取消資格，故僅剩下 4 席，均為首次擔任議員，分別來自旗津兩大家族（陳光亮、潘財源）及兩位鹽埕醫師（楊金虎、駱榮金），而楊金虎又力壓群雄，為臺籍第一高票當選，可見其實力。

昭和 14 年（1939）第二屆高雄市會的選舉，楊金虎繼續參選，也如願連任。此次高雄市因人口增加，民選席次增為 16 席，臺籍則包辦增加的 2 席，從上次當選的 5 席增為 7 席，除楊金虎外，潘財源、陳光亮同樣連任，僅駱榮金未連任，新增了王天賞、蔡崇禮、陳騰雲、林塗盛。

日治時期晚期，臺灣總督府對高雄臺籍政治菁英，一是推動「皇民化運動」，強迫其對日本政府交心，另一則將不聽話者以捕風捉影方式，製造冤獄，則是「高雄州特高事件」。

「高雄州特高事件」為大戰期間日本特高警察在高雄州鳳山、東港、旗山、旗後四個地區，所製造的冤獄，這四地許多臺籍菁英被逮捕，甚至冤死獄中，如臺南開業律師歐清石、旗後仕紳王天賞、潘致祥等人均遭逮捕。³²

在高雄特高警察四處監視並羅織罪名下，也使得臺籍政治菁英個個人心惶惶，楊金虎在回憶錄中提及，自己原被列為被捕名單，後因答應出任「皇民奉公會」高雄州支部生活部長才免於入獄：

……及遭中日事變而大東亞戰爭續發，日本政府欲挽回民心起見，須要用吾輩作看板（招牌），網羅全島社會運動同志任命皇民奉公會幹部，如林獻堂先生、杜聰明先生、林茂生先生、蔡式穀先生、黃朝清先生、林呈祿先生，等或充作動員部長，或命為生活部長，或為其他幹部之職，豈出本意耶，鄙人受命為本高雄州第二代生活部長實如青天霹靂之感，何謂呢？蓋因原來是一個被監視人物，一朝負此重任，豈是自然嗎？況當時到處正在檢舉臺灣冤獄事件，吾輩同志多被扣留於獄中，連吾人出診之時，常受日憲隨後臨檢，可謂戰戰兢兢、人心不安之秋，雖被不自然之任命，亦不得不維命是從，引為光榮……³³

31 〈自治の初議政壇上に光彩を放つ三市選良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（1935 年 11 月 24 日），第 5 版。

32 吳榮發，〈高雄州特高事件概述 1941-1945〉，《高市文獻》，19（3）（2006），頁 1-33。

33 楊金虎，〈七十回憶（上）〉，頁 61。

無論如何，楊金虎在日治時期末期加入皇民奉公會，可說是日治時期臺籍政治菁英避免入獄的選擇，但這項選擇在戰後付出代價，並導致其與郭國基之間的紛爭。

肆、二二八前高市政治發展與楊金虎

昭和 20 年（1945）8 月 15 日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。因為日人遭遣返，外省籍接收人士也是以市府各機關及公營高層為主，社會領導階層則以臺人為主，在此情形下，臺人也一吐在日治時期被壓抑的政治、經濟怨氣，勇於參選或從商，與新政權積極往來，建構新的政商網絡。楊金虎也與以往日治時期合作者一改以往的和諧關係，彼此競逐，其中與郭國基、黃賜、林迦最為激烈。

在「高雄州特高事件」中，原籍東港的郭國基，其妹婿張明色、堂兄郭生章均被逮捕，郭國基為營救兩人，最後卻自己捲入其中，不僅也被捕，更遭指稱裝置無線電指示盟軍轟炸高雄要塞及高雄港，後因同學烏飼虎雄當時任職於高雄法院檢察官，暗中保護才撿回一命，這也使郭國基在戰後以報仇為訴求，名噪一時。³⁴

也因此，國民黨於民國 35 年（1946）6 月 1 日，在高雄市成立黨務指導員辦事處時，就以郭國基為指導員，當時楊金虎也希望加入國民黨，但被郭國基以其在日治時期末期曾加入「皇民奉公會」，並將孫中山塑像捐給日本人，討日人歡心為由，拒絕其加入國民黨，讓楊金虎憤恨難平，兩人心結，就此種下。³⁵

除了郭國基，另一位前民眾黨的黃賜也與楊金虎產生爭執。大戰甫結束，國府決定由連謀來接收高雄時，楊金虎就與其他人先籌組歡迎委員會，但黃賜、郭國基另組新生活促進會，並將楊金虎、陳光燦、何傳、商霖、林塗盛、蔡天鳳、薛丁貴等人列為御用紳士。兩人同時在連謀市長的歡迎會上，攻擊楊金虎。³⁶

34 後高雄特高課長仲井清一戰後遭人偽裝憲兵殺害，一般均直指郭國基主導，見林曙光，〈高雄州下四大冤獄〉，收於《打狗瑣譚》（高雄：春暉，1993），頁 300-301。

35 照史（林曙光），〈民主鬥士——郭國基〉，收於照史，《高雄人物評述 第一輯》（高雄：春暉，1983），頁 30-31。

36 楊金虎，〈七十回憶（上）〉，頁 90-91。



圖6 楊金虎（右）與陳啟川（左）（高雄市第五屆候選人登記時合影）

資料來源：謝惠民，〈高雄市第五屆候選人登記·楊金虎·陳啟川〉，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，登錄號：KH2002.009.183。

由於郭國基、黃賜的反日印象頗受民眾支持，兩者均在市參議員選舉中脫穎而出，郭國基還更上層樓當選省參議員，而楊金虎等人被郭國基點名者，均缺席戰後初期的市參議員及省參議員選舉。

除了以郭國基為主的「黨派」，當時高雄市政界另一較重要派系是以市參議員王清佐為主的「三民主義青年團」，與其交好者有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、高雄陳家陳啟川等人，但此派也與楊金虎並未有太多互動。「黨派」與「團派」是高雄市戰後初期兩大派系，³⁷ 相形之下，楊金虎在皇民奉公會事件後，無法投靠派系，盟友不多，一直要到戰後首任高雄市長連謀下臺後，才找到反擊「黨派」的機會。

37 王御風，〈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（1920-1960）〉（臺北：玉山社，2013），頁281-289。

原本頗受市民期待的連謀，因任內市府貪污舞弊傳言不斷，於民國 35 年（1946）5 月 18 日遭撤換，改以臺籍的黃仲圖接任。³⁸ 在新市長的歡迎會中，就有人在會場外懸掛海報，指「郭國基、林迦、彭清靠、李炳森、黃賜」五人為「前市長一派」。在歡迎大會上，楊金虎更直接表示「一部市參議員，與前市長連謀勾結營商」，此言一出，市參議會特別在會議上認為楊金虎污辱市參議員，要求楊金虎說明。

面對市參議會的質疑，楊金虎表示他未曾說是市參議員，應是市參議會誤會，但市參議會如真要計較，他則指名道姓列出黃賜吞沒國軍慰問金等事件，³⁹ 將其與黃賜爭論擴大，反擊戰後初期所受到的打壓，後黃賜因此移送法院審理，法院認定無罪，但楊金虎與這批日治時期抗日戰友之嫌隙更見擴大。

伍、二二八事件與楊金虎、黃賜、郭國基

二二八事件發生於 1947 年 2 月 27 日的臺北，經過數日，3 月 3 日，由臺北南下的民眾數百人，與高雄當地民眾匯集後，開始圍攻警局、憲兵隊並毆打外省人。4 日凌晨，各警察局線路多被割斷、失去聯絡，員警武器多被民眾劫去，甚至許多臺籍員警也加入群眾陣營，市區也進入混亂狀態，軍警與群眾發生零星衝突，許多地點，如省立第一中學、煉油廠均組成自衛隊，維持秩序、並將外省籍民眾集中管理。

5 日，市參議會依照臺北方式，組織高雄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，下分治安、宣傳、糧食、醫療等組，以議長彭清靠為主任委員。但市區並未因此平靜，群眾開始攻擊要塞司令部，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遭受攻擊後，決意反擊。在兩者中斡旋之市長黃仲圖、議長彭清靠及群眾領袖涂光明、范滄榕、曾豐明，於 5 日下午拿出民間的「和平條款」，希望能上山與彭孟緝談判，但彭不允許。

6 日上午 9 時，市長黃仲圖、議長彭清靠、苓雅區長林界、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績、群眾領袖涂光明、范滄榕、曾豐明等 7 人，獲允上山談判，雙方談判破裂後，彭

38 王御風，〈連謀主政下之高雄市（1945.11-1946.5）〉，《高市文獻》，19（4）（2006），頁 36-57。

39 〈高雄市黃參議員 吞沒國軍慰問金案 楊金虎氏提出答辯〉，《民報》（1946 年 6 月 27 日），第 2 版。

孟緝將7人逮捕，並立即出兵，中午12時出發，主要目標有二；一是市政府，另一則是火車站、第一中學，其目標就是位於市府，以市參議員為主的「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」，以及有大批外省籍居民被扣留的第一中學。軍隊在兩地點四處掃射，造成許多民眾及市參議員傷亡，並開始進行逮捕。⁴⁰

與楊金虎衝突不斷的黃賜在二二八事件中死於市府，楊金虎在其回憶錄中表示：「……尤其好出風頭的黃賜君亦喪了生命，真是可憐。他曾反面不認友誼，極力誹謗余，排擠余，結果一場空，不勝浩嘆之至，聖經記著：『伸冤在乎主』，這句話是真理也。」⁴¹可見互相之不快。

實際上，除了黃賜，郭國基與楊金虎也未能躲過二二八事件的牢獄之災。郭國基當時人在臺東，回到臺北後，立即面見陳儀要求解除高雄戒嚴令，陳儀答允後，命謝東閔陪同南下，但火車僅到楠梓就無法前進，謝東閔只好北返，郭國基借了一臺腳踏車上壽山將手令呈彭孟緝後，發現情勢不對，遂立即躲避，直到事件過後，魏道明擔任省主席時才出面投案入獄。⁴²

而楊金虎在彭孟緝鎮壓當日（3月6日）即被逮捕，隔日才被釋放，月餘後再被逮捕入獄，並遭刑求，經過40日的監禁才被釋放。經過二二八事件後，郭國基、楊金虎兩人與政府則漸行漸遠，最後都成為黨外要角，尤其是郭國基出獄後，因憤恨國民黨如



圖7 楊金虎《七十回憶》書影

資料來源：〈楊金虎——七十回憶〉（1967），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典藏資料，登錄號：KH2006.016.058。

40 王御風，《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（1920-1960）》，頁290-296。

41 楊金虎，《七十回憶（上）》，頁94。

42 照史（林曙光），〈民主鬥士——郭國基〉，頁10-11。

此待他，立即退黨，⁴³ 對往後臺灣政壇，有一定程度影響。

事隔多年後，民國 57 年（1968）的縣市長及省議員選舉，楊金虎出馬競選市長，郭國基則挑戰省議員，兩人聯合競選的聲勢相當浩大，於是中央日報就挖出戰後初期兩人的恩怨，郭國基立即在《中國晚報》刊登聲明，表示「絕無此事」，而《中央日報》也刊登楊金虎自傳《七十回憶》中楊金虎指責郭國基文章反駁。而根據郭國基兒子郭拔山的回憶，當年選舉曾有人搓合楊金虎與郭國基聯合競選，但楊金虎反應冷淡，甚至最後郭國基競選採用「楊金虎一票、郭國基一票」，也為楊金虎反對而作罷，郭拔山認為這是「道不同不相為謀」。⁴⁴

陸、楊金虎與林迦

戰後楊金虎與日治時期友人立場相左，除了臺灣民眾黨的郭國基、黃賜外，應屬林迦。前已述及，當初楊金虎會來到高雄，主要是林迦的邀請，最早的診所，也位於林迦與黃慶雲合建的住屋。

林迦與黃慶雲主導的興業信用組合，在黃慶雲驟逝後，由日人手貝千代志擔任組合長，戰後日人離臺，原理事李炳森被推派以「代理理事長」身分，行使理事長（組合長）的職權，李炳森立即聘請林迦之子林瓊瑤為囑託，⁴⁵ 熟悉業務，實際上也等於是林瓊瑤來負責興業組合的業務。

民國 35 年（1946）8 月 18 日，興業信用組合召開戰後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，主要任務就是改選理事及理事長。當時表態要競選理事長的就是楊金虎，根據李炳森的回憶，林瓊瑤一開始認為他不是楊金虎對手，並未想競選理事長，僅想當常務理事，但當時的

43 許雪姬、方惠芳、吳美慧、曾金蘭、丘慧君、林世青、蔡說麗，〈郭拔山先生訪問紀錄〉，收於許雪姬、方惠芳、吳美慧、曾金蘭、丘慧君、林世青、蔡說麗，《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（下）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，2015），頁 59。

44 郭拔山，《郭國基選壇馳騁錄》（高雄：大舞台書苑，1977），頁 251-255、287。

45 林瓊瑤在 1937 年，黃慶雲擔任組合長時即已擔任常務理事，接替生病的馮課。但次（1938）年卻倦勤離職，黃慶雲也於當年過世，所以由日人手貝千代志接任。見林曙光，〈高雄合作事業簡史〉，頁 23。

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鼓勵林瓊瑤挑戰楊金虎，⁴⁶於是興業組合的經營權戰爭就此開打。

18 日的理事選舉，結果如下：朱再發（十一票）、張啓口（八票）、林瓊瑤（七票）、藍日榮（七票）、王石定（七票）、黃朝聰（七票）、楊金虎（六票）、王隆遜（六票）、郭萬枝（五票）。⁴⁷其中郭萬枝與林迦同為五票，原應抽籤決定，但林迦立即聲明讓賢。

由於理事長是由楊金虎與林瓊瑤對決，因此兩派分別開始拉票。其中王石定先生為楊金虎襟弟，林瓊瑤在早稻田的同學，因此王石定聲明他會票投楊金虎，但會幫林瓊瑤拉票。除了王石定外，另一位是黃慶雲的三子黃朝聰，當年林瓊瑤留學日本時，是與黃慶雲諸子一起生活，更與黃朝聰共同就讀名古屋中學，於情於理都應該支持林瓊瑤，但黃朝聰卻表態支持楊金虎，郭國基對此自告奮勇，出面協調，最後由林瓊瑤答應當選後不支薪為交換黃朝聰支持的條件。但開票後林瓊瑤雖然以六票比三票勝出，黃朝聰卻未遵守諾言，將票投給楊金虎，這也使得黃慶雲及林迦兩家族關係不若以往。⁴⁸

楊金虎與林迦家族間的恩怨不僅於此，前述二二八事件時，當楊金虎二度入獄，據說軍事法庭指定需由陳啟川或林迦出面保釋才願意放人，但陳啟川不肯出面，楊金虎妻只好去找林迦，在林迦協助下，楊金虎終被釋放。

二二八事件後，因中央行憲關係，在民國 36 年（1947）底舉行第一屆的國民大會及立法委員選舉，由於國大代表為每縣市選出一名，立法委員則以全臺為一選區，所以此次選舉以國大代表較為激烈。高雄市的選區最後有楊金虎、林迦及鼓山區區長林澄增出馬。在尚未登記時，林迦風聞楊金虎有意參選，曾拜訪楊金虎，希望能改選立委，但楊金虎拒絕，使林楊間嫌隙更加擴大。⁴⁹兩者競爭更是此次選舉的重頭戲。

選戰開跑後，楊金虎就因其在二二八事件中曾以「公共危險罪」判刑一年、緩刑三年之關係，被宣布其選舉權無效，引起軒然大波。楊金虎登記後，選舉委員陳桐以其曾被判刑，認定其無法參選，讓楊金虎相當不服，除上訴臺灣省及中央相關選舉機構外，更大動作在報章刊登廣告，表示其所依據之「國大代表選舉罷免法第五條」為：中華民

46 李炳森，〈興業信用組合的追憶〉，收於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，〈三信六十週年誌〉（高雄：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，1978），頁 85-86。

47 〈高雄信業信組舉行總代會〉，《民報》（1946 年 8 月 21 日），第 2 版。

48 李炳森，〈興業信用組合的追憶〉，頁 86-87。

49 照史（林曙光），〈打狗拓荒者——林迦〉，頁 32-34。

國國民未滿二十歲，無後列情事之一者，有選舉權：一、犯刑法內亂外患罪，經判決確定者。二、曾服公務而有貪污行為，經判決確定者。三、剝奪公權而未復權者。四、受禁治產之宣告者。五、有精神病者。六、吸用阿片或代用者。而其判刑之罪為「公共危險罪」，並非「內亂外患」，因此其應該有選舉權。⁵⁰

經過臺灣省轉中央等層層討論，在選前一天，停止競選活動前一小時，也就是 11 月 20 日下午 5 時，宣布楊金虎具有選舉權。楊金虎士氣大振，趕印傳單四處分送，由於選舉共有三天，因此楊金虎卯足全力宣傳，終於後來居上，以 11,838 票擊敗林迦的 10,445 票及林澄增的 9,028 票，當選第一屆國大代表。⁵¹ 而楊金虎的回憶錄則認為，他在二二八事件的第二次入獄，就是為了阻擋他參加此次選舉。⁵² 這也說明日治時期交情甚篤的林迦及楊金虎，彼此越走越遠。

柒、結論：二二八事件前後高雄臺籍社會領導階層之變遷

在二二八事件中，許多臺籍政治菁英因此身亡，也有眾多臺籍菁英因目睹或親身經歷後，對政治心灰意冷、退出政壇，使得二二八事件成為臺籍社會領導階層一個很重要的斷層。但近年來的研究也慢慢指出，二二八事件前，其實臺籍社會領導階層就已出現各種分合，⁵³ 以高雄市來說，如果以楊金虎為切入點，正可看到從日治時期晚期至二二八事件前後，臺籍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。

日治中後期，醫師是臺籍社會領導階層變化的關鍵角色，醫師這個新興社會領導階層，通常可以跨越區域，並成為新地區的社會領導階層。以楊金虎為例，其出身臺南歸仁，後來應林迦邀請來到高雄，很快就成為鹽埕地區的社會領導階層之一。

而鹽埕地區也從 1920 年代晚期逐步發展，成為高雄最重要的商業中心，此地的臺籍商人也以林迦為中心，形成一個緊密的網絡，尤其在林迦、黃慶雲將原來在中洲的「中

50 〈候選人楊金虎 身份發生問題 惟渠仍作競選問題〉，《中華日報》（1947 年 11 月 17 日），第 3 版。

51 楊金虎，《七十回憶（上）》，頁 113-120。

52 楊金虎，《七十回憶（上）》，頁 97。

53 陳翠蓮，《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——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》（臺北：時報，2003），頁 239-245。

洲漁農信用販賣購買生產組合」搬遷至鹽埕成為「興業信用組合」後，這也成為鹽埕臺籍社會領導階層的主要網絡，後期林迦更以此為藍本，打造「新高建築信用購買利用組合」。這兩個組合，也就是戰後的「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」及「高雄市第四信用合作社」，此為鹽埕商人大本營，除了商人外，當時在鹽埕有名望的醫師也介入其中。

臺籍醫師除了商業行為，也熱衷於政治，不僅是臺灣文化協會及臺灣民眾黨的重要幹部，也積極參與 1935 年後的議員選舉，像楊金虎兩次都高票當選，自然與工運領袖黃賜、政治領袖郭國基等人有所來往，建構出龐大的社會網絡。

但在戰後日人離開後，臺籍社會領導階層也開始出現分裂，如「高雄州特高事件」受害者的郭國基就在戰後指責參與「皇民奉公會」的楊金虎，也不允許楊金虎加入國民黨，郭國基等人則在首次的市參議員選舉中均高票當選。

隨著政府接收的失敗，戰後第一任市長連謀突然被撤換，戰後初期被打壓的楊金虎就指責「郭國基、黃賜、林迦、彭清靠、李炳森」為「前市長一派」，並在「興業信用組合」選舉理事長時與林迦之子林瓊瑤正面對決。這次選舉中，與楊金虎站在同一陣線的僅有黃慶雲之子黃朝聰，而鼓勵林瓊瑤與楊金虎對抗的是市參議會議長彭清靠，代理理事長是則李炳森，協助林瓊瑤與黃朝聰協調的是郭國基，正符合「前市長一派」的組合，在兩派實力懸殊下，楊金虎派失敗。也可看出，在二二八事件之前，臺籍社會領導階層，尤其是舊鹽埕系統者，早已分裂。

二二八事件發生後，楊金虎依然站在林迦的對立面，只是當年楊金虎因郭國基指責其參與皇民奉公會，民意基礎不佳，如今在二二八事件後，反而獲得民意支持，以被害者身份，一舉擊敗實力堅強的林迦，而與林迦同一陣營的郭國基，則在二二八事件後，脫離國民黨，與楊金虎成為戰後初期黨外的戰將，只是兩人之間的不快，並未完全化解，而郭國基則與林迦仍維持良好關係，⁵⁴ 可見這些社會領導階層間的分合，也不能完全以黨派來解釋。

換言之，二二八事件對於高雄臺籍社會領導階層，確實有其影響，但拉長距離來看，從戰後初期，日人離開後，臺籍社會領導階層就為了彌補真空，展開分合，二二八事件是戰後第二次的重組，而這段時期臺籍社會領導階層的恩恩怨怨，也對後來高雄的政治、經濟，帶來了變化及影響。

54 郭拔山，〈郭國基選壇馳騁錄〉，頁 383-387。

參考書目／

一、中文

（一）專書

- 王御風（2013）·《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（1920-1960）》。臺北：玉山社。
- 林曙光（1993）·《打狗瑣譚》。高雄：春暉。
-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（1978）·《三信六十週年誌》。高雄：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。
-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（2008）·《高雄三信九十週年誌：輝煌九十》。高雄：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。
- 許雪姬、方惠芳、吳美慧、曾金蘭、丘慧君、林世青、蔡說麗（2015）·《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（下）》。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。
- 郭拔山（1977）·《郭國基選壇馳騁錄》。高雄：大舞台書苑。
- 陳柔縉（2009）·《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》。臺北：時報出版。
- 陳翠蓮（2003）·《派系鬥爭與權謀政治——二二八悲劇的另一面向》。臺北：時報。
- 楊金虎（1990）·《七十回憶（上）》，收於張玉法、張瑞德主編·《中國現代自傳叢書第二輯》。臺北：龍文。
- 照史（1983）·《高雄人物評述 第一輯》。高雄：春暉。

（二）期刊論文

- 王御風（2006）·〈連謀主政下之高雄市（1945.11-1946.5）〉·《高市文獻》·19（4）·頁36-57。
- 吳榮發（2006）·〈高雄州特高事件概述 1941-1945〉·《高市文獻》·19（3）·頁1-33。
- 鄭志敏（2006）·〈日治時期高雄地區臺籍醫師的政治與社會參與（1920-1945）〉·《高市文獻》·19（1）·頁13-56。
- 鄭志敏（2009）·〈從「市參議員」到「悽慘議員」——論二二八事件前後的第一屆高雄市參議員〉·《高市文獻》·22（1）·頁37-68。

（三）報紙

- 〈候選人楊金虎 份發生問題 惟渠仍作競選問題〉（1947年11月17日）·《中華日報》·第3版。
- 〈高雄市黃參議員 吞沒國軍慰問金案 楊金虎氏提出答辯〉（1946年6月27日）·《民報》·第2版。
- 〈高雄信業信組舉行總代會〉（1946年8月21日）·《民報》·第2版。

二、日文

（一）專書

- 《高雄州下官民職員錄》（1937）。高雄：高雄ニイタカ社。
- 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》（1910）。臺北：臺灣日日新報。
- 中山馨、片山清夫（1985）·《躍進高雄の全貌》。臺北：成文。
- 杉浦和作（1929）·《高雄州商工人名錄》。臺北：台灣實業興信所編纂部。
- 柯萬榮（1931）·《臺南州名士錄》。臺南：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。
- 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（1934）·《臺灣人士鑑》。臺北：株式會社臺灣新民報社。

（二）報紙

- 〈自治の初議政壇上に光彩を放つ三市選良〉（1935年11月24日）·《臺灣日日新報》·第5版。
- 〈打狗土地漲價〉（1920年8月24日）·《臺灣日日新報》·第6版。
- 〈打狗鹽業協會の設置〉（1902年2月28日）·《臺灣日日新報》·第2版。

